

东亚和东南亚 海外华人商业研究的反思*

颜清滢

Abstract

This paper reflects upon some of the findings in my research on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past years. It re-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business of the Ethnic Chinese, their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s,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siness, I reassert that Confucianism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men,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Chinese educated. But some of the Confucian values have been modified to suit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overseas. In relation to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 reinforce the findings of some scholars that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s characterized by a pyramid-shaped structure and a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style.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congruent with Confucian values of hierarchy and paternalism. I also reassert that the duplication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which characteriz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provides stability and long-term interest for the Ethnic Chinese companies.

On the issue of business networks, I re-emphasize that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 本文乃根据2002年9月18日在吉隆坡所作的公开演讲稿修订而成。该学术演讲是由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办,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协办。

颜清滢 澳洲阿德雷德大学历史系教授。Dep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5005. E-mail: chinghwang.yen@adelaide.edu.au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02

networks are rooted i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Ethnic Chinese, and the special environment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where they conducted their business activities. They were based on the complex networks of human relationship of the Chinese, and operated on the basis of guanxi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xinyong (personal trust).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play a role in the history of Ethnic Chinese and their modern business. With regard to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ship, I reassert my previous findings that an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 belongs to a type of modern Chinese entrepreneur, and possesses all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a modern entrepreneur. He has effectively integrated capital, labour and risk-taking into a modern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has also integrated Confucian values with Western business practices.

一、海外华人商业与儒家传统的关系

这十多年来,研究海外华人商业的中外学者日渐增多,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儒家传统与海外华人商业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外的学者对这问题各持己见,见仁见智。基本上学者们可分为两组:第一组学者认为儒家传统与海外华人商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海外华人商业的形成,成长,组织和管理,都深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强调历史与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¹第二组学者们却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海外华人商业的兴起与儒家传统毫无关系。海外华人商业之所以能够在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起很大的作用。主要是经济和政治因素,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当地政府的正确与务实政策给海外华人带来了极大的商机,因此海外华人商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当然,这批学者压低历史与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²

我认为这两组学者各有长处和偏差。前者过分强调历史与文化的因素容易流于泛泛之谈,而后者则过分注重经济与政治的因素,过于狭隘。其实历史,文化的因素必须与经济和政治因素作有机的结合。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外华人商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但在原有的历史与文化的框架下得到更完整的解释。

儒家传统的内涵是什么?海外华人社会到底保留了多少儒家价值观念?儒家的价值观对海外华人商业有着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所要讨论

的问题。儒家的中心思想是礼和仁。他们是在维持社会稳定和治国的两个大原则。从礼演绎出来的忠孝观念是维系中国封建制度的两大支柱。儒家的价值观念是通过教育, 风俗习惯和社会活动来影响海外华人社会。(颜清煌 1991; Yen 1995a)。那些受华文教育的海外华人, 他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比那受英文或东南亚其他语文教育者来得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海外经济, 政治与文化的变迁弱化了海外华人社会所保留的儒家传统。在儒家传统中影响海外华人商业行为最主要的有孝道, 忠于职守, 家族主义, 相互的责任, 敬老敬贤及和睦共处等观念。他们都是从儒家中心思想“礼”与“仁”衍生出来。在这些观念中, “和睦共处”与“相互责任”对海外华人商业行为影响最深(Yen 1995a)。海外华人常提到“天时, 地利, 人和”是商场上成功的要素。以现代的术语来解释, 天时就是政治经济环境, 地利即地理环境, 而人和就是和睦的人际关系。在搞好雇主与雇员良好的“劳资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许多近代与现代的海外华人企业家把他们的企业当作是一个大家庭。雇主和雇员都属于大家庭的成员(Yen 1995b)他们的关系不是剥削者的关系, 相反的他们共存共荣, 在不同的岗位上分工合作, 为了公司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贡献。他们的关系是和谐与合作, 不是对抗与猜忌。

“相互责任”(reciprocity 或 mutual responsibility)的观念衍生于儒家思想的“仁”与“忠”, 也就是规范上峰与下属关系的准绳。“仁爱”“仁恕”不仅是上峰对下属应持的正确的态度, 同时也是道德上的责任。另一方面, 下属有责任以“忠诚”和“忠心”来回报上峰。这“相互责任”观念影响海外华人企业家对雇员的态度。他们有责任照顾员工的生活和福利, 给员工们合理的待遇。在回报雇主的“仁爱”与照顾, 员工们忠于职守, 尽他们的能力把企业搞好。³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儒家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海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西方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冲击, 儒家价值观要作多少的修正。在中华文化强势的地区, 如台湾, 香港,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儒家价值观还能保留相当强劲的势头(见李焯然 2002)。相反的, 在华人较少及中华文化较弱的地区, 包括印尼, 菲律宾, 泰国等, 儒家价值观似乎

应作较大的修正。

二、海外华人商业组织及管理模式

一般来说，海外华人商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跨国的大企业属于少数。1970年代末香港大学的黄绍伦教授（Professor Wong Siu-Lum）对香港华人企业作实地的调查，发现38,000华人企业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属于小型的家庭企业，雇员的人数少过50人（见Wong Siu-Lun 1985）。家庭企业的基础是家庭主义（familism），那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经济单位。企业是由家庭出资创办控制和管理。由于家庭企业的规模小，员工大部分与家庭有着血缘的关系，分工的要求没有迫切的需要。所以在组织上比较散漫，一位研究海外华人商业的权威学者高伟定教授（Professor Gordon Redding）认为海外华人家庭企业组织的特征是“组织弱势，联系强劲”（weak organization and strong linkage）（Redding 1991）。在解释人文现象时，高伟定教授只是以文化和管理的因素稍作解释，不够深入。我认为文化的因素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的“人治”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而制度次之，因此忽略了组织和制度，即使有建立一些制度也不致力推行。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要想在商业上成功，人际关系必须搞好。儒家“人治”的思想也直接影响海外华人商业的管理方式，强调人的因素，把人的潜力尽量发挥出来，这样可以导致企业的蓬勃发展。海外华人著名企业家，台湾塑胶集团的创办人王永庆提到企业的优良管理的三个先决条件，即勤劳，知识与经验，其中尤以勤劳最重要（见王永庆1998）。

海外华人中小型家庭企业组织和管理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金字塔”型的组织和“轴心型”的管理（centripetal）。金字塔型的组织非常简单，普通分为三层：最高层是经理和副经理，经常由创办人或他的子侄们担任。下一层是高级职员，他们与家族有些血缘，地缘或姻亲的关系，或者是由外面聘请来的专业人士。最底层的一般员工，他们可能与企业拥有者的家庭有些疏远的关系或者完全没有关系。“轴心型”的管理模式极适合“金字塔”型的组织。那就是所有的决定权集中在最高决策者手中，决策的过

程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见 Tong 1991）。这种由上而下而权力集中的管理模式有时也被称为家长式的管理（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这种“金字塔”型组织和“轴心型”的家长式管理有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在中小企业中，“家庭主义”成为企业强劲的纽带把管理人员和员工们紧紧拉在一起，由于他们和企业在家中拥有直接和间接的亲属关系，所以他们愿意勤奋工作使企业迅速与蓬勃发展。由于管理层与员工的分歧不大，他们可以同心协力，为着共同的目标奋斗，同时，由于他们与企业拥有者的家庭有着亲密关系，他们都能为着企业的前途忠诚地工作，不容易受高薪或其他诱惑，而遭到敌对企业所挖角。因此，企业可以保持平稳的发展。团结与稳定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这给海外华人中小企业具有竞争的尖锋。除此之外，这种“金字塔”型组织和“轴心”型的家长管理模式给决策者许多灵活性。决策者不须要每一事都照章行事，或要经过冗长的开会讨论来作决定，这样可以缩短决策的时间，比别人抢先一步。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海外华人的金字塔型组织和家长式管理也不能例外。强调“家庭主义”必然会导致裙带风（nepotism）。由于强调亲属关系，在用人方面难免带有偏见，用人不在贤而在亲，这样使企业丧失一些有才干的人并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或导致企业的倒闭。⁴ 轴心的权威使权力过分集中在上层的极少数人手中，权力不能下放，工作不能有效地分配给下层，而上层的极少数人又要承担繁重的业务。这样又杜绝了下层的自发性，一直要依赖上峰的指示而行，上下无法顺利沟通，企业的革新受阻（Tong 1991）。

海外华人家族所控制的跨国大企业，虽然属于少数，但这数字是日渐增加中，而这些跨国大企业集团中有许多都是人们所熟知。如台湾王永庆的台塑集团，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和黄集团，泰国谢氏家族所控制的正大集团（C. P. Group），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郭氏家族所控制的丰隆集团，印尼林瑞良家族所控制的三林集团等。这些跨国的大企业，都是上市公司，但家族还是控制大多数的股权和企业的管理权。他们的组织和管理都具有欧美，日本和韩国跨国大企业的特征，强调分流发展（diversification），注重

效率，专业知识与人才，竞争策略等。⁵ 他们组织的基本形式也是金字塔型，不过，这金字塔型比海外华人中小企业的组织复杂得多。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是董事会，掌管公司的最终决策。有关公司发展和扩张的策略，财政，人才及其他资源的分配的重大决策都要得到董事会的首肯。董事会的成员主要包括家族的重要成员，⁶ 董事经理或副经理，再加上一些功能董事 (Functional Director)。这些功能董事带有浓厚的政治因素，他们与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⁷ 金字塔的中层就是管理层 (management)，除经理和副经理的职位外，一些中层的管理人员有许多是由外面聘请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及管理知识对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是很重要的。在金字塔的底层就是一般普通的职员和工人。虽然海外华人大企业拥有现代西方跨国大公司的特征，但还受到华人传统的影响，还多少带有“家长式”的色彩。

海外华人大企业组织和管理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管理权与所有权的重叠。在单一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往往该企业的创办人自任董事主席，掌公司的决策权。集团的总经理通常由创办人的兄弟或子侄担任，行政权力很大。集团属下的主要子公司的经理也大都由可信任的亲属担任。⁸ 在多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董事主席当然由几个家族的伙伴轮流担任，而企业集团的主要行政人员也由各家族的成员中选出担任。有时，大股权拥有者的家族成员并未踊跃参与集团的管理。⁹ 这管理权与所有权合一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证家族的控制权，而能更有效地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同时，它也可以提高管理人员的权威 (Redding 1990)。在人际关系极端重要的海外华人社会，董事经理当然比受薪经理具有更大的权力，而备受员工们尊敬。由于经理是由家族的主要成员所担任，他们处处都以家族的利益作考虑，不会轻举妄动，把公司的前途当赌注以博得个人的荣耀和奖赏。海外华人大企业的管理权与所有权重叠的事实常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认为这制度阻碍企业的发展。他们认为管理权与所有权应该分开，主要管理人员应由杰出的专业人士担任，这样企业可以获得快速发展。但这种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也有许多弊病。第一，许多专业的管理人员都是以高薪和短期合约聘请，他们在聘期内要把公司的业绩搞好以巩固他们的位置。这往往驱使他们采取短线的策略，而忽略长远的利益。第二，许多专业管理人员

都是为了高薪和优厚报酬而工作，他们对雇主不忠心，很容易被其他公司挖角。第三，自从美国大企业集团，如安隆（Enron）和 World.Com 等的破产丑闻以后，许多人都可以看到这些高层受薪的专业管理人员都利用职权以谋取私利，对公司的前途和生存置之不顾。

三、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的建构及其意义

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商业网络这课题已普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¹⁰ 学者们不仅认为商业网络对海外华人商业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要了解以后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及中国发展的前途也有帮助。那么，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的渊源何在？它的文化与社会基础是什么？它在海外华人商业活动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无可怀疑的海外华人商业网络植根于历史，文化以及他们在东亚和东南亚商业活动的特殊环境，与欧洲人殖民不同，华人自隋唐以来（七世纪）与东亚和东南亚发展的商业贸易都属短暂性，他们没有殖民定居的观念，而在一些重要通商口岸建立商业网络以牟利。¹¹ 后经宋元时期的巩固发展，到十七世纪中叶明末清初时，东亚与东南海亚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已根深蒂固，而海外华人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商业贸易也占有一席之地（见李金明 1990；张彬村 1998；陈希育 1991）。自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的两百年间，东亚和东南亚海外华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直接影响他们的商业地位和商业网络。这巨变是由两个因素交叉导致的结果。第一，十七世纪末见证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地区势力扩张的深化。到十九世纪末，欧洲列强的英，荷，法，西班牙几乎控制东南亚大部分的土地，控制了东南亚区的商业贸易，把海外华人商改变为仲介商，替新的殖民地经济秩序服务。第二，由于 1842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同时由于欧洲殖民地政府在东南亚发展矿业和经济作物（cash-crop agriculture）需要大量的贱价劳工，因而吸引大批华工到东南亚垦殖和定居。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华人人口骤增，这给华商发展商业网络提供有利的条件。¹²

商业网络的文化与社会基础是华人的 interpersonal network，这关系网是建筑在

个人的关系 (*guanxi*) 与个人的信用 (*xinyong*) 上。“关系”并不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而这概念只表示两者之间带有亲切和相互责任的感觉。一位澳州政治学家杰克斯教授 (Bruce Jacobs) 曾对“关系”下个定义,他认为是一种“带有个别性和独特性而非意识形态的纽带,而这纽带是建立在共享认同的基础上”(见 Jacobs 1976 和 1980)。¹³ 在海外华人社会,这种共享认同 (*shared identification*) 就是宗亲,乡亲和同学的关系。早期华人移民东亚和东南亚的亲属移民模式 (*kinship immigration*) 以及华籍移民缺乏祖国的政治保护加强了血缘与地缘的关系。¹⁴ 二十世纪期间,华族移民的后裔在当地接受西方或华文教育,毕业后在商界服务,同学的关系日形重要。同时,由于宗亲会,会馆以及校友会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Yen 2000 和 2002a), 所以血缘,地缘和学缘成为建构商业网络的重要基石。

建构商业网络的另一个重要基石是个人的“信用” (*xinyong*), 也就是英文的 *trust*, 或翻成中文为“信任”。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巴伯氏 (Bernard Barber) 以社会学的观点把“信任”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一般性的信任, 那就是说对人类的一种自然和理性的信任, 相信人不会无缘无故杀人; 第二类就是对专业功能的信任, 那就是说信任医生会医治好你的病, 而工程师可以建造桥梁; 第三类就是对社会功能的信任, 那就是说信任警察会维持治安, 而政治家和政府公务员会忠诚地履行他们的任务。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氏 (Max Weber) 却把信任分为两大类: 特别性的信任 (*particularistic*) 及普遍性的信任 (*universalistic*)。前者是建立在血缘的关系上, 而后者则建立在宗教的共同信仰上 (见 Weber 1951)。香港大学的社会学家黄绍伦教授在研究香港华人商业时也把“信用”分成两类: 制度的信用 (*systematic trust*) 及个人的信用 (*personal trust*)。前者包括政治制度和司法机构, 而后者则包括个人的关系, 诸如血缘和地缘的关系 (Wong Siu-Lun 1991)。黄绍伦在研究香港的上海籍纺织企业家时发现个人的信用是这些企业家成功的六大要素之一 (Wong Siu-Lun 1988)。其他研究印尼、香港和越南华人商业的学者也都强调个人信用在华人商业上的重要。

既然个人信用如此重要，它在华人商业交往的功能上又如何？它对建构商业网络起了什么作用？基本上个人信用的功能有三：第一，它作为华人商业交往的滑润剂，使商业顺利进行；第二，它可以抑制和制裁商业上不良的行为诸如诈骗或食言等；第三，它可以简化商业交易的手续，而使商业交易迅速进行。在分析个人信用对海外华人商业交易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了解。第一层就是在两个商人，或两个商业家庭或两个商业集团的商业交易。最初“信用”要经过不断的考验而建立起来，而这“个人信用”是缓慢和循序渐进的，一直到稳固地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但这个个人信用还是要继续维持下去。第二个层面就是个人信用在华人商界所起的作用。当某商人建立良好的个人信用之后，他也间接地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他的“商誉”也就不胫而走（Barton 1983）。这样许多商人都乐意和他做生意。他们可以信任他，信任他的商号或他的商业集团，甚至可以信任他的亲戚或他所介绍的人。在建构商业网络时，个人信用尤其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海外华商深受儒家“人治”观念的影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制度的关系退居次要。另外一方面因为历史的关系，海外华人散居各地，没受到祖国的保护，同时居留地政府的司法制度也有不相同之处，难以依赖法律来进行商业贸易。

无可怀疑的，网络在海外华人商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对历史的考察以及对现代商业集团的研究，不难发现网络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在廿世纪七十年代，当东亚东南亚海外华人商业尚未崛起之前，网络的角色似乎更形重要。不管在资金的筹集、人事的安排、企业的发展及跨国性的扩张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陈锦江教授（Wellington K.K. Chan 1982 和 1998a）对香港光施公司的研究，本人对香港和上海永安公司的研究（Yen 1995b 和 1998a）柯理博士（Godley 1981）对张弼士在东南亚商业帝国的研究，J. Panglaykin 和 I. Palmer（1970）以及 Yoshihara Kunio（1989）对黄仲函商业帝国的研究，杨进发博士（1987）对陈嘉庚的研究，黄绍伦教授（1988）对香港的上海籍纺织企业家的研究，以及谢国真博士（1994）对台湾台南帮的研究中找到许多历史的见证。在这个时期，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海外华人商业在东亚和东南亚的

崛起铺路。在廿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电脑及资讯科技的发达削弱了传统纽带在华人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这使到有些学者认为当海外华人企业成长和最终完全西化时，传统的网络将被摒弃（Lim, Linda Y.C. 1983）。更有一位学者认为华人商业网络是一个毫无作用的神话（Gomez 1999）。

无可否认的，当海外华人企业在发展和扩张时，他们必须吸取西方商业的长处，诸如企业的计划，财务的计算和人事的管理方面，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改变为西方式的企业。这种改变也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企业的跨国扩展主要还是在亚洲区域，而主要的客户还是亚洲人。具有亚洲文化特色的华人商业网络当然还有存在的价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兴起了一股以地缘和血缘为主的世界联谊会的风潮，诸如国际客家联谊会，世界潮州联谊会和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等。这些联谊会的召开印证了传统商业网络对海外华人商业国际化或环球化所起的作用。这些联谊会大都是每两年或三年召开一次，而在世界不同的城市举行。虽然联谊会强调联络感情和促进文化与教育，更重要的是沟通商情建立国际商业网络（Yen 2002b）。华人商业网络在海外华人商业国际化和环球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由国际华商大会的成立和召开得到体现。第一届国际华商大会于1991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¹⁵ 该会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参加者非常踊跃，有来自世界30个国家75个城市的800位华商代表，并由著名华裔学者作专题演讲，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资政为大会主旨演讲人。¹⁶ 这是一次很成功的集会，把世界各地华商集合起来，共商发展世界华人经济和商业前途。华商大会接着在香港，曼谷，温哥华，墨尔本和中国召开，并建立秘书处和资讯网络以沟通联络（Yen 2002b）。

四、海外华人企业家与企业精神

有关“企业家”（entrepreneur）这名词最早可追溯到十七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的经济学家坎地朗（Cantilon）把那些从事较有冒险性商业活动的人称为“企业家”。他所指的是那些承包商和贩卖农产品的小商人；而他所说的“企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指具有“冒险性”的商业行为。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企业家”的定义有所改变。1776年，英国

著名的经济大师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在他出版的划时代巨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 一书中描述“企业家”是一位具有远见而能创建一种新工业的商人。他是一位工业的领袖, 能够体察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需要来制造新产品。亚当史密斯眼中的企业家已不仅是敢于冒险的商人, 而必须具有远见而能创建新企业的商业领袖。虽然亚当史密斯给“企业家”作了比较明确的定义, 但他并没有把“企业家”的重要性加以阐述。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 “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才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1871年,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卡尔门哲 (Carl Menger) 出版他的名著《经济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一书, 认为经济的变革不是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 而是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家”因了解环境变化的需要来推动经济变革。这些“企业家”是经济变革的主导人。他们把经济资源改变成供一般人可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卡尔门哲把“企业家”列为生产四大要素之首, 那就是“企业家”, 土地, 劳力和资本。他坚信土地, 劳力和资本并不能自动地迎合人类消费的需求, 除非企业家愿意冒着风险把这些生产要素集合起来, 把他们改变成可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卡尔门哲不仅把“企业家”的地位提升了, 他也肯定亚当史密斯的“企业家”定义, 那就是企业家不仅是经济的冒险者, 也是新兴企业的创建者及工业生产的领袖。

有关“企业家”和“企业精神”的定义自卡尔门哲以后维持不变, 一直到1934年当另一位著名的奥地利籍经济大师桑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的出现而有所修正。桑彼得是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的经济系教授。他曾发表一系列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论文。他认为“企业精神”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破坏动力, 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导力。他认为“企业家”是一位改革者, 以经济手段破坏原有旧的生产方式而促使改革。他的“企业精神”的中心点是“创新” (innovation), 那就是不断地利用新的发明和新的科技来制造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

近十年来, 我曾发表一些论文企图对“海外华人企业家”和“海外华人企业精神”作另一个较明确的定义。同时对他们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较全面的解释。在我几年前所发表的“香港与上海的永安公司: 一个现代海外

华人企业的个案研究, 1907-1949” 论文中, 认为“海外华人企业家”, 如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郭乐和郭泉兄弟, 是属于中国现代企业家的一种类型。他是一位能有效地把资本, 劳力和管理结合起来而成功地创建现代企业的商人。他具有资本家最基本的态度, 那就是强烈追求利润和财富的意念, 有勇气担当风险和决心实现创业计划。同时, 他具有远见和商业判断力以及创新的精神。他也具有领导, 沟通及管理企业的能力。换句话说, 他不仅是企业的创建者, 也是企业的延续者 (Yen 1995b)。后来, 我在 1997 年发表的“陈嘉庚与海外华人的企业精神” (Tan Kah Kee and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一论文中以海外华人著名的大企业家陈嘉庚为例, 印证我对“海外华人企业家”所下的定义。我指出作为“海外华人企业家”, 陈嘉庚和其他海外华人企业家一样具有强烈追求利润的意念。但他追求财富的目的并非为个人和家庭的利益着想, 而是要利用赚来的钱财来兴办教育, 以达到“教育兴国”的崇高理想 (见 Yen 1986b)。

至于“海外华人企业精神”的定义, 我认为它是一种具有充沛动力, 而不断制造财富的过程。它是由具有远见而敢承担风险的海外华人企业家不断地整合儒家的文化价值和西方的商业经验与科技来创造, 发展和革新企业, 在整合儒家传统和西方商业经验和科技时, 他们所经历的路程与日本及韩国的现代企业家一样, 那就是不断地筛选和整合东西文化的精华以便更有效地管理企业和创造财富。

注释

- 1 这组学者以香港大学管理学系主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tudies) 高伟定教授 (Professor S. Gordon Redding) 为代表。他写了许多篇学术论文, 并于 1990 年出版他的名著, 《华人资本主义的精神》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阐述历史与文化对海外华人企业的影响。此外, 强调历史与文化对海外华人企业有影响的包括美国学者西林 (Robert H. Silin), 巴敦 (Clifton Gilbert Barton); 香港学者黄绍伦 (Wong Siu-Lun) 和金耀基 (Ambrose Y.C. King); 台湾学者黄光国和谢国兴; 及澳州籍华裔学者王赓武和颜清湟等。详见 Silin (1976); Barton (1977); Wong Siu-Lun (1998); 金耀基 (1992: 64-85, 128-169); 黄光国 (1998); 谢国兴 (1994); 王赓武 (Wang Gungwu) (1991a, b 和 c: 79-101, 181-197, 258-272);

- 颜清滢 (Yen Ching-hwang) (1995a 和 b: 196-254; 2002a, b, c 和 d: 3-78, 123-144)。
- 2 前新加坡经济学者 Linda Y. C. Lim 于 1976 年研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企业时, 她认为当华人商业进入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和以现代科技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时, 它将失去任何“种族特征”(ethnic character)。虽然有些公司源于传统的华人商业, 但他们的运作方式与华人传统不同, 而与其他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相似, 强调在国际市场获取最高利润, 见 Lim, Linda Y. C. (1983: 245); 另一位马来西亚经济学家 Edmund Terence Gomez 比 Linda Lim 更进一步认为文化与传统与华人商业没有关系。他认为华人的商业网络是一种神话。他研究马来西亚一些著名华人企业家, 发现他们之间少有沟通合作, 所以他断言“种族间的商业网络”不存在。因此他在他著作的结论时以“华人商业网络——破除一个神话”(Chinese business networking-dispelling the myth) 为标题, 见 Gomez (1999: 183)。
 - 3 有关“相互责任”观念的讨论, 见 Hodder (1996: 51-75)。
 - 4 有关“裙带风”的讨论, 见 Redding (1990: 107, 158)。
 - 5 有关正大集团 (CP Group) 的分流发展, 见日本学者 Akira Suehiro (1998: 10-12); 有关印尼三林集团 (The Salin Group) 的分流和竞争策略, 见日本学者 Yuri Sato (1996: 265-279)。
 - 6 有关正大集团董事会的组织, 成员和权力, 见 Suehiro (1998: 20)。
 - 7 有关马来西亚功能董事的定义和功能, 见 Lim Mah Hui (1981: 68-69); 有关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 如云顶集团 (Genting Bhd.) 的功能董事, 见 Sieh (1992: 110)。
 - 8 这里我们可以以新马区郭氏家族所控制的丰隆集团为例。集团的创办人郭芳枫 (Kwek Hong Png) 一直担任集团的董事主席一直到 1984 年退休为止。退休后主席一职由他的大儿子郭令明接任, 他的次子郭令裕 (Kwek Ling Joo) 也在丰隆集团担任要职。早在 1969 年, 郭芳枫已委任侄儿郭令灿 (Kwek Ling Chan) 为丰隆马来西亚区的董事经理, 1973 年, 郭令灿已全权处理马来西亚区的业务。详见郭芳枫 (1987); Oral History Interview Transcript (1983: 1-21)。
 - 9 这里可以以新加坡的华侨银行集团为例。这庞大的海外华人金融集团由几个家族所控制: 这包括李光前 (Lee Kong Chian) 家族, 李俊成 (Lee Choon Seng) 家族, 李伟南 (Lee Wee Nam) 家族, 陈锡九 (Tan Siak Kew) 家族, 陈振传 (Tan Chin Tuan) 家族和杨邦孝 (Yong Pang How) 家族。虽然李光前家族是集团最大的股权持有者 (约占 20 巴仙), 但这家族成员在集团的管理则属低调。其实, 较小的股权持有者的家族成员常被选任集团的主要行政人员如陈振传和杨邦孝。见 Lim Mah Hui (1981: 91-92; 1983: 285-288); 有关华侨银行早期 40 年的历史 (1932-1972), 见 Wilson (1972); 有关华侨银行集团后期的扩张及陈振传所扮演的角色, 见 Loh 等 (2000)。

- 10 根据统计, 自 1996 至 1999 的 4 年间, 最少有 10 次国际性的大型研讨会和小型的讨论会在亚洲, 北美, 欧洲和澳洲等地举行讨论有关华人商业网络及相关的课题, 见 Chan (2002: 序言及注释)。
- 11 有关早期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商业贸易, 见 Reid (1992 和 1993: 1-61)。
- 12 有关鸦片战争后欧洲殖民地政府在定居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地区发展矿业和经济作物所吸引中国劳工的史实, 见 Wong Lin Ken (1965: 17-52); Jackson (1968: 1-92); Heidhues (1992: 43-44); Breman (1990: 45-64)。
- 13 有关“关系”与华人网络的社会分析, 见金耀基的一篇出色论文 (1992b: 页 64-85)。
- 14 有关这问题的讨论, 见颜清湟 (1991: 4-10, 33-100)。
- 15 大会于 1991 年 8 月 10 日至 12 日在新加坡文华大酒店举行。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编 (1991: 封面)。
- 16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永裕序言。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编 (1991)。

参考书目

- BARTON, Clifton Gilbert 1977. *Credit and Commercial Control: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Businessman in South Vietnam*.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 1983. Trust and credit: some observations regarding business strategies of Overseas Chinese traders in South Vietnam. 载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ume 1: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Linda Y.C. Lim 与 L.A. Peter Gosling 编. Singapore: Maruzen Asia.
- BREMAN, TAMING 1990. *Taming the Coolie Beast*.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impression).
- CHAN Kwok Bun (主编) 2000.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State, Economy and Culture*.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 Nordic-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 CHAN, Wellington K.K. 1982.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irm and its modern reform.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special issue on East Asian Business History), LVI.(56): 229-232.
- 1998. 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the Sincere and Wing On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1900-1941. 载 *Asian Department Stores*, Kerrie L. MacPherson 编.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 陈希育 1991. 《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GODLEY, Michael R. 1981.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MEZ, Edmund Terence 1999.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 Accumulation, Ascendance, Accommodation*.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郭芳枫 1987。《我与丰隆》。新加坡：丰隆集团。

黄光国 1998。《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北：远流图书公司。

HODDER, Rafert 1996. *Merchant Princes of the East: Cultural Delusions, Economic Success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HEIDHUES, Mary F. Somers 1992. *Bangka Tin and Mentor Pepper: Chinese Settlement on an Indonesian Is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ACKSON, James C. 1968.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1921*.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JACOBS, Bruce 1967. The cultural bases of factional alignment and division in a rural Taiwanese town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 (1): 80-81.

----- 1980. *Local Politics in a Rural Chinese Cultural Setting: A Field Study of Mazu Township, Taiwan*. Canberr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金耀基 1992a。〈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诠释〉。收入《中国社会与文化》，金耀基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1992b。〈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的诠释〉。收入《中国社会与文化》，金耀基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1992c。〈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收入《中国社会与文化》，金耀基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金明 1990。《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焯然 2002。〈儒家思想与海外华人社会〉。收入《社会变迁与文化诠释》，何国忠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LIM, Linda Y.C. 1983. Chinese business, multinationals and the state: manufacturing for export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载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ume 1: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Linda Y.C. Lim 与 L.A. Peter Gosling 编. Singapore: Maruzen Asia.

LIM Ma Hui 1981.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One Hundred Largest Corporation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 The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large corporations in Malaysia: the role of Chinese businessmen. 载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ume 1: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Linda Y.C. Lim 与 L.A. Peter Gosling 编. Singapore: Maruzen Asia.

LOH, Grace, GOH Chor Boon and TAN Teng Lang 2000. *Building Bridges, Carving Niches: An Enduring Legac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NGLAYKIM, J. 与 PALMER, I. 1970.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one Chinese concern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 (1): 85-95.
- Oral History Interview Transcript* 1983. Interview with Mr. Quek Hong Png (Kwek Hong Png) dated 7th September 1982.
- REDDING, S. Gordon 1990.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1991. Weak organizations and strong linkages: managerial ideology an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收入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Gary Hamilton 编.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REID, Anthony 1992. The unthreatening alternatives: Chinese shipping in Southeast Asia, 1567-184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sl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1790s-1990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November 23-26.
- 1993.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2: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ATO Yuri 1996. The Salin Group in Indonesia: the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of the largest conglomerate in Southeast Asia. 收入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Volume 1, Ampalavanar Brown 编. London: Routledge.
- SIEH Lee Mei Ling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laysian business groups. 载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Ruth McVey 编.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ILIN, Robert H. 1976. *Leadership and Values: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Taiwanese Enterpris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 SUEHIRO Akira 1998. Modern family business and corporation capability in Thailand: a case study of the CP Grou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March 31.
- TONG Chee Kiong 1991. Centripetal authority, differentiated network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in Singapore. 收入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Gary Hamilton 主编.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ANG, Gungwu (王赓武) 1991a. Little dragons on the Confucian periphery. 收入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Wang Gungwu 著.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1991b.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收入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Wang Gungwu 著.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1991c.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erchants. 收入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Wang Gungwu 著.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王永庆 1998. 《王永庆谈中国式经营管理》。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WEBER, Max (trans. Hans H. Gerih) 1951.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Macmillan Co.
- WILSON, Dick 1972. *Solid as A Rock: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the Overseas-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Singapore: Overseas-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 WONG Lin Ken 1965.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WONG Siu-Lun 1988.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The Chinese family firm: a mode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58-72.
- 1991.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trust. 收入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Gary Hamilton 主编.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谢国奥 1944. 《企业发展与台湾经济——台南帮的个案研究》。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编 1991. 《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专辑》。
- 颜清滢 (栗明鲜, 陆宇生等译) 1991. 《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YEN Ching-Hwang (颜清滢) 1995a.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a preliminary study. *Studies in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1995b. The Wing On Company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a cas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enterprise, 1907-1949. 收入 *Studies in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Yen Ching-Hwang 著.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1998a. Wing On and Kwok brothers: a case study of pre-war Chinese entrepreneurs. 载 *Asian Department Stores*, Kerrie L. MacPherson 编.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 1998b. Tan Kah Kee and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sian Culture*, 22: 1-13. 收入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usiness, Culture and Politics*, Yen Ching-Hwang 著.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2000. Historical background. 载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 Beng 编. Shah A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a.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a historical survey. 收入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usiness, Culture and Politics*, Yen Ching-Hwang 著.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2002b.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收入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usiness, Culture and Politics*, Yen Ching-Hwang

著.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2002c. The rise of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收入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usiness, Culture and Politics*, Yen Ching-Hwang 著.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2002d. Traditional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载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usiness,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YONG, C.F. 1987. *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OSHIHARA, Kunio 1989. *Oei Tiong Ham Concern: The First Business Empire of Southeast Asia*. Kyoto: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张彬村 1988。〈十六至十八世纪华人在东南水域的贸易优势〉。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张炎宪主编。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